

希特勒档案



[英]兰·戴福顿 著
文 思 译

希特勒档案

[英]兰·戴福顿 著

文 思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希特勒档案

[英]兰·戴福顿 著

文 恩 译 责任编辑 管黔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孟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290000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15-02157-2/L·233 定价:11.90

译者序

—

兰·戴福顿(Len Deighton),192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家境不佳,早年做过铁路职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在皇家空军特别调查部任摄影记者。退伍后进入美术学校学习,首先求学于圣·马丁美术学校,因成绩优异,又荣获奖学金进皇家美术学院深造,同时利用晚间在餐馆当招待员,进行半工半读。毕业后,到美国纽约求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图书插图绘制员。然后返回伦敦,在一家广告公司当美术部主任。

戴福顿多才多艺,虽以美术工作为职业,但在餐馆工作的经历使他对烹调术具有浓厚的兴趣,出版过烹饪专著《实用菜谱》(Action Cookbook)和《法国烹调基础》(Basic French Cooking)。

离开广告公司后,戴福顿移居多尔多涅,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的处女作《伊普克利斯文件》(The Ipcress File)于1962年出版,获得了极大成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放弃了美术工作而投身于专业创作,先后创作了国际间谍小说、战争小说20余部。主要有《水下之马》(Horse Under Water)、《柏林的葬礼》(Funeral in Berlin)、《百万美元的头脑》(Billion-Dollar

2074/56

Brain)、《死得其所》(An Expensive Place to Die)、《轰炸机》(Bomber)、《宣战》(Declarations of War)、《观察入微》(Close up)、《间谍故事》(Spy story)、《昨日间谍》(Yesterday's Spy)、《杰出的小间谍》(Twinkle, Twinkle, Little Spy)、《SS - GB》(SS -GB)、《再见吧,米老鼠》(Goodbye Miekey Mouse)、《柏林游戏》(Berlin Game)、《墨西哥态势》(Mexico Set)、《伦敦竞技》(London Match)等。

戴福顿的作品以描写细腻、史实详尽、人物众多、场面宏大而著称。国际评论界认为,他与英国的另一名多产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 1932~)是全球成就最高的当代国际间谍小说作家。

戴福顿不仅从事小说创作,而且写作纪实文学和历史著作之类的非虚构作品,其中较重要的有《战斗机》(Fighter)、《飞船毁灭》(Airshipwreck)、《闪电战》(Blitzkrieg)、《英国战役》(The Battle of Britian)。他的这些辛勤劳动还为他带来了历史学家的崇高声誉。

二

长篇国际间谍小说《希特勒档案》(原名《XPI》),是戴福顿1982年出版的近作。

在希特勒德国占领整个西欧,称雄一时之际,英国战时内阁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大义凛然、独当一面,以毫不妥协的态度与纳粹德国奋战,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面旗帜,为最后战胜法西斯势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而受到世界人民的

崇敬和爱戴，被《时代周刊》评为 20 世纪上半叶风云人物，享有崇高的国际声望。

针对这位早有定评的正面人物，戴福顿却大胆挖掘史料，深钻历史空子，虚构出在法国沦陷、英国孤军作战获胜无望之际，丘吉尔向希特勒屈膝求和的情节。其立意之新奇，令人赞叹。作为对二次大战史有深透研究的史学家，戴福顿在本书中披露了许多未录于正史的史料（例如希特勒的病历、丘吉尔在法国沦陷前后的行迹），使读者增加了知识，也使小说显得新鲜、有趣、深刻和真实。

全书以丘吉尔向希特勒屈膝求和的秘密会谈记录为主线，生动细腻地刻画了美、英秘密警察与苏联克格勃之间为争夺这一文件而展开的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同时还入木三分地描写了美、英之间，间谍机关上下级之间的互不信任和勾心斗角。

一般的间谍小说往往只注重于情节的紧张、曲折、离奇和怪异，很少注意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刻画，也不太顾及场景和细节的描写。因而，间谍小说一直无法挤入正统文学作品的殿堂，而只能作为通俗小说徘徊于殿门之外，戴福顿的间谍小说却独树一帜。他在保证情节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书中主要人物斯图尔特、斯泰因、布累斯罗、克莱伯和雷登爵士等人都是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甚至出场不多的次要人物弗朗茨·韦弗尔都有相当完整的艺术形象。青年时代的韦弗尔一直梦想当英雄，却又只能在通讯部门像文官一样度过他的军人生活。他的唯一英雄业绩是在多瑙河救出了一个溺水的儿童。从此他将这孩子的照片当作自己毕生所得的最高奖赏随身珍藏。战后，他在英国的

穷乡僻壤过着贫困的养鸡场主生活，但是他在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经历使他始终无法安宁度日。他对所有的人说话都真假掺半，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谋杀的厄运。谁又能不对这个可悲的小人物抱以深刻的同情呢！

戴福顿的细节描写是很有特色的。前面留下的伏笔，往往要很久之后才会有所照应，使人读后恍然大悟，茅塞顿开。例如，斯图尔特探访韦弗尔时，韦弗尔做出了许多手足失措的怪异举动，使人莫名其妙。直到他猛吸自制的卷烟之际，读者才体会到，作者着力刻画了一个想戒烟以节约开支，却又没有毅力控制自己的瘾君子。

戴福顿的视野开阔，学识渊博。故事发生于欧、美、非等洲众多国家，时间跨度达30余年。但作者却游刃有余，有条不紊地以多线头写法从容不迫地展开了情节。其总体构思既严谨又奇巧，二次大战30年后发生的事件仍以二次大战时的人物为主角，颇有些中国古典小说大师的写作风格。

许多间谍小说往往以色情描写来吸引读者，这种做法是戴福顿所不齿的。戴福顿的小说语言素雅，情节健康。

总结这些特点，我们可以说，此书一方面像优秀侦破小说一样有浓厚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另一方面又像古典名著一样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是戴福顿最有代表性的佳作之一。

三

译者根据英文原著，并参考德文译本翻译此书，并选用德

译本的副标题《希特勒档案》(Das Hitler-Protokoll)作为本书译名。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有关背景知识,译者增添了百余条注释。翻译过程中,得到我国英语界前辈学者杨树勋教授的悉心指导,德国朋友科尔特·莱因哈特博士(Dr·Kurt Reinhardt)给予了极大帮助。译者在此谨表由衷的谢忱。

译 者

1992年4月于长沙

1

1979年5月，英国保守党新政府刚刚上台不久的一天，内阁一个常务秘书把一只黄色文件夹交给首相。他是负责首相与情报部门联络的官员。文件夹里装着秘密情报部第六局给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日报。

黄色文件夹里的文件从来不按机密、绝密等分级，因为秘密情报部第六局的文件永远是最高密级。但是，一份字迹潦草的手书被画上了特殊标记。首相诧异地注意到，这是秘密情报部第六局局长西德尼·雷登爵上的手迹，于是立即关注地拿起这份文件。文件的左上角用大头针别着一份广告，它剪自上星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出版的一份电影杂志。

在第六局的文件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电影制片商在广告中宣称，他准备“拍一部耗资1500万美元以上的巨片”。其主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所掠夺的珍宝的去向。剪报上盖着第三十二号研究室的橡皮图章，旁边是找到这份广告的官员的签名。广告上质问：“凯塞罗达矿井的真正秘密何在？”凯塞罗达一词下面有红铅笔画的一道线，表明是这个地名使那个谍报员认识到了这份广告的重要性。

在蓝色图章中间留有空档，用来填写索引号。通常总要在里面填上某个号码。谍报员查遍了索引卡片箱，使他迷惑不解的是，在凯塞罗达的索引卡片上没有列举任何文件号，仅仅写着：“交局长亲阅，火速呈上。”

首相仔细阅读着西德尼·雷登爵士的评注，不止一次地为他那无法辨认的字迹而头痛。然后，她抓起电话，推迟了当天的几项日程，以便立即招见雷登爵士。

当天下午，在唐宁街十号^①门厅站岗的老警官看到国际事务文献中心档案部主任陪同西德尼爵士莅临。在这里见到档案部主任使他颇为惊讶。首相上任伊始，百事待举，怎会有暇顾及档案！但他很快又镇定下来了：新当选的政府，上台伊始免不了要做出一些超出常规的惊人之举。

档案部主任没有参加首相与西德尼爵士的会晤，而是在楼下的接待室等着随叫随到。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招见。

这是首相与谍报部门负责人的首次正式会谈。她觉得与他交谈相当不舒服。他举止彬彬有礼，外貌庄重威严，个头很高，头发奇长，眉毛极浓。会谈结束时，她站起来，暗示她认为谈话已经结束。但是西德尼爵士却并不急着走。“我可以基本肯定，这些令人担忧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首相。”他说。

他暗自问自己，是不是应该称她为“夫人”？她瞪了他一眼，使他觉得好像犯了什么过错。

西德尼爵士的烟瘾并不像他的前任那么大，但现在也感到首相严格禁止吸烟是很难忍受的。他真想抽一支雪茄。以

① 英国首相官邸的所在地。

前，卡拉汉^①，甚至卡拉汉的前任威尔逊^②当政时，这些房间里经常是烟雾弥漫的。

“我们会搞个水落石出的。”首相果断地说。

“我在 24 小时内就派人去加利福尼亚。”

“你不打算通知美国人吗？”

“那是不明智的，首相夫人。”他抚平耳边几根散乱的头
发。

“我也这么认为。”她说。她又从桌上拿起那份剪报。“现在
我们只需要这个电影制片商给我们一个清楚而又明确的答
复。”

“根据我与好莱坞电影制片商多年来打交道的经验，要做
到这一点可能很困难。”

首相看了西德尼爵士一眼，想弄清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以便做出适当的反应。她决定还是不露出微笑。西德尼爵士
似乎不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2

引起英国首相极大关注的这一事件也引起了苏联谍报机

① 卡拉汉(Leonard James Callaghan, 1912~):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
1976~1979 年任英国首相。

② 威尔逊(Sir James Harold Wilson, 1916~):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
1964~1970 和 1974~1976 两度出任英国首相。

关的警觉。我们很难在这里记述和概括其详细经过。为这件事俄国人已经忙乱了好几个星期了。1979年4月15日是复活节^①。那天傍晚，一份由两个部分组成的长电报发送到华盛顿特区16街东端的苏联大使馆大楼，它讨论的问题显然也是这件事。这份不期而至的电报只有俄国的高级密码员才能看懂。当时，在美茵大街首都游艇俱乐部附近的彼尔第七饭店的一个私人包间里正举行复活节晚宴，密码员正与他的俄国朋友欢聚一堂。使馆立即派车把他接了回来。

美国国家安全局也截获了这份电报，并用马里兰州乔治堡的阿特拉斯计算机破译了它，从而第一次知道了莫斯科给这个行动所取的代号：玻哥尼任务。苏联情报总局格鲁乌在1962年发出书面命令，明确规定选用代号时必须做到使敌方无法根据代号了解行动的任务以及政府的意图和态度。事后，命令的适用范围又扩大到克格勃和武装部队。命令中还指示，不允许使用太庸俗和太宏伟的代号，以免在行动败露时给人留下笑柄。尽管如此，美国国家保密局的译码员还是用粉红色薄纸写了一份附加报告，说他们看出了莫斯科选用这个代号的原因。

从字面上说，“玻哥尼”是肩章的意思。但是对苏联公民而言，它却有更深的含意。它不仅用来表示大人物或者高级将领，而且还是万恶的反动派的象征。革命者曾经高呼。“杀死戴金肩章的人”。当然，这个克格勃代号的言外之意还可能引申得更远，因为在苏联还有另一个与克格勃有矛盾的谍报组

^① 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为复活节。

织格鲁乌，领导格鲁乌的高级军官也戴金肩章。

我们不知道尤里·格里晓科是如何理解这个新任务的代号的。格里晓科是克格勃高级官员，目前是苏联的“合法驻外代表”。在外交官身分的掩护下，他的任务是代表莫斯科及时掌握在美国的所有苏联间谍的活动。作为实权仅次于大使的人，格里晓科之所以派驻使馆只是因为需要把隐蔽活动和卑鄙伎俩与公开的外交活动彻底区分开。这样，如果美国当局发现了某些秘密勾当，大使就可以毫无愧色地宣布自己绝不知情。

格里晓科在外交官名册上列为海军少校，职务是海军武官助理。他是个头发于燥卷曲的小矮个儿，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和一张大嘴。他引人注目的唯一特征是有一颗金门牙，笑的时候，它闪闪发光。但是他并不经常笑，因为这会暴露他内心的隐秘。格里晓科是俄国人忧郁寡欢的典型代表。

格里晓科作为外交官的地位与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很难协调的。昂贵的西装、金表、镶珍珠的领带别针、裤子后袋里一沓沓厚厚的钞票、驾驶赛车、没有规律的工作时间，所有这一切都向华盛顿那些专门监视这些细节的人暗示：格里晓科是克格勃的人。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克格勃驻使馆的高级间谍头目——“合法驻外代表”。

由于格里晓科的行动受限制，所以他命令由他直接指挥的间谍头子来华盛顿。这是与正常工作程序相违背的，因此他在电报命令中说明了这一任务的紧迫性。这天早上，格里晓科到阿纳康斯梯亚河对岸的植物园去郊游。他不慌不忙地溜达着，在确信没有人跟踪之后，才返回城市，到豪华的海·亚当斯饭店赴约。从那里可以看到拉斐特广场及广场后的白宫。

爱德华·帕克夫妇在饭店面对第16街的入口大厅与格里晓科碰头。格里晓科已经用“格叔”的名字预定了座位。爱德华·帕克是个矮壮、满脸络腮胡子的人。他有斯拉夫人的脸形：三角形的下巴、灰白色的卷发和浓密的眉毛。他比他的日本老婆和格里晓科都高。他满面笑容地用力握住格里晓科的手。他身上穿着苏格兰厚呢子大衣，这显然是为了应付芝加哥的天气。因为这时的华盛顿阳光迷人，气温高达华氏50度。

格里晓科轻轻地亲吻了房子·帕克的面颊，笑了笑。房子大约三十四五岁，非常漂亮。她懂得如何把自己洁净白嫩的东西娃娃脸打扮得令人入迷。她身穿一件浅色羊毛罩衫，罩衫的正面有一排从上至下的麻麻密密的扣子。领口有一颗很大的菊花形金饰针。乍一看，这三个正在进餐的人很像衣着考究的使馆官员。华盛顿的上等餐馆中到处挤满了这样的人。

帕克的公开身分是半导体收音机元件进口商。这些廉价元件主要是台湾、朝鲜、新加坡制造的。那里的工入有足够的力量生产这些元件，但不幸的是却没有足够的力量要求美国人和欧洲工人那样高的工资。帕克以这种身分自由自在地在美国国内外跑来跑去。它是克格勃的“非法驻外代表”的最理想的伪装。帕克负责全美国的苏联间谍活动，只有某些特别行动例外，它们由驻华盛顿大使馆和以纽约市联合国总部为中心的权力庞大的“跨地区网”直接管辖。

下午2点20分，格里晓科吃完了他的奶酪蛋糕。他们要了咖啡和香槟。帕克夫人向两位先生告辞，因为在返回芝加哥之前，她还要买些东西。格里晓科和帕克让她走了。他们开始谈他们的“生意”。

帕克是12年前来到北美洲的。他的英语几乎达到了炉火

纯青的地步。他不费吹灰之力就适应了生意兴隆的美国商人那种豪爽而又诚恳的举止。然而，他生来就是苏联公民。在派到美国来之前，他曾在克格勃总部第一司的科学技术部工作过二年。现在，格里晓科正用急促的俄语小声告诉他“玻哥尼任务”的重要性。他全神贯注地聆听着。他被授权调用由他管辖的所有长期潜伏特务。自从派到美国来，帕克一共只有五次被授予这么高的决策权。波恩、巴黎和伦敦的驻外代表也被授予了类似的权力。

另外，格里晓科还透露，总部第一司把玻哥尼任务的指挥权交给了第十三科。他俩都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第十三科已经在1969年改名为“行动执行科”，但是原来的知情者还是喜欢称之为“克格勃总部第一司第十三科”。它的主要职能是做“湿货生意”，也就是从讹诈到酷刑，到谋杀，无所不为。

第十三科目前由传奇人物斯坦尼斯拉夫·休莫克指挥。克格勃实际上的领导机关苏共中央组织部对他的评价极高。人人都知道，休莫克为了达到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帕克没有说话。格里晓科心不在焉地呷着黑咖啡。他俩心照不宣：如果这个行动失败，他们都会有极不愉快的下场。片刻之后，他们开始用英语继续交谈，主要是讨论一些关于汽车维修的技术问题。帕克的妻子的汽车还在保修期就经常出故障，搞得帕克很烦恼。帕克注意到——而且不是第一次——格里晓科有点可怜巴巴的神态。这与他听到的别人对格里晓科的评价相矛盾。帕克感到奇怪，为什么格里晓科只在他面前如此垂头丧气和精神沮丧。

帕克夫妇坐晚上的飞机飞回芝加哥了。尤里·格里晓科在弗吉尼亚州州界旁边的一家汽车旅馆幽会了他的女友——

在苏联商业代表团工作的一位苏联姑娘。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听到他对她大吵大嚷。格里晓科醉得很厉害。

3

尽管向首相作了郑重保证，但秘密情报部第六局局长并没有马上派特工人员去加利福尼亚。局长与他女儿杰尼菲的一次谈话延误了这件事。杰尼菲推荐了一个适合到大洋彼岸执行这项任务的人，那就是她的丈夫。

“波伊德真让人厌烦。”她对父亲说，“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已经分手。在宴会上，看到他坐在对面，我就觉得大煞风景。我希望你给他一个差事，把他打发得远远的，”她娇昵地抱着父亲的脖子，“直到离婚手续办完。”

局长点了点头。他真不该同意她与自己的部下结婚，特别是这样一个根基不牢、举止傲慢的年轻人。对于他们之间的两性关系，本应该听其自然，可是西德尼爵士却逼迫他们结婚，结果造成这么多悔之不及的后果。

“他本来就在待分配名单中嘛，爸爸，”她机灵地劝导着。

波伊德·斯图尔特是个38岁的派遣特务。按规定，派遣特务必须定期返回大本营，做一年的“行政事务”。现在他正好做满一年，工资提高了一点，马上又要派到海外去。这样的派遣特务在伦敦的办公室坐上整整12个月是很难受到那些长年坐办公室的职员的爱戴的。他们处理日常琐事和公文信函

往往急躁、简慢和漫不经心。在这些缺点之上，波伊德·斯图尔特还要加上骄傲自大的毛病。12年的派遣特务生涯使他没有耐心忍受大本营职员表现出的优越感。

“他可以在加利福尼亚为我们做点工作。”局长说。

“啊，爸爸，你不知道那该有多好！不单是对我，”她急忙补充，“而且对波伊德。你知道他是多么讨厌办公室啊！”

局长很清楚波伊德·斯图尔特多么讨厌办公室工作。他经常在宴会席间向他的岳父局长大人诉说自己宁可再派到海外去。但是局长没有帮他作任何安排。局长认为，替近亲说情会引起人家的闲言碎语。

“任务很紧迫，”局长说，“他在周末以前就必须上路。”

杰尼菲亲吻父亲。“你真好。”她说，“波伊德了解加利福尼亚。他作为校际交流学生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过一年。”

* * *

波伊德·斯图尔特是个面色黝黑的英俊男子。他的仪表再加上娴熟的德语、波兰语和流利的匈牙利语使得他可以冒充中欧地区任何国家的居民。斯图尔特在战争年代出生于莱茵兰的一个平民俘虏营中，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波兰人。战后，斯图尔特先后在德国、苏格兰和瑞士读中学，然后进了英国的剑桥大学。在剑桥，他成绩优异，体育超群。这些长处再加上他的语言天才使他通过了严格的审查，成了英国间谍机关的一名新秀。

“你说没有文件？西德尼爵士。”在一个无法忘却的夜晚，他与杰尼菲吵得很凶。西德尼·雷登爵士在凌晨四点钟赶来把女儿接回了娘家。从那以后斯图尔特与岳父就再不曾有过